



南北朝文学通述六题

顾 农

摘要:南北朝政局的纷纭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文学的面貌,丰富了文学家们的阅历,增长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精神力量。先前的门阀贵族至此大抵演变为书香世家。儒家思想的地位明显下降,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共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相当多的作家纷纷努力于艺术上的创新。这一时段的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通俗化的倾向,然后又提升为雅俗共赏,南朝主要表现在诗的方面,北朝主要表现在文的方面。南北各民族表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并且在种种纷纭斗争包括战争中逐步走向了融合。

关键词:南北朝文学;政局;门阀;世家;雅俗;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I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3-0083-09

中古后期共约三百年,其中东晋十六国约一百年,南北朝约二百年。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宏观大要,田余庆先生有如下的总结: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1]356}这一阶段遗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遗产,还有

南北两边的文学作品,它们反映了纷纭复杂的历史变化,描写了自然、社会和人心,具有永垂不朽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于南北朝阶段的文学,有些贯穿全局的问题,兹略举六点分述如下,以供参考批评。

一、政局与文学

中古后期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政局不稳,反复震荡,争夺政权和霸权的斗争空前激烈,不仅多次改朝换代,而且在各王朝内部,种种类型的斗争和杀戮也非常残酷。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从客观方面看,正是反复震荡的政局丰富了文学家们的阅历,增长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精神力量。

这里有各种类型,首先是有一批帝王文学家,例如宋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父子都富于文才,鲍照在文帝手下任职,不敢显示才华,故意把文章写得很差,以免盖过了皇帝的风头^①。刘义隆最后被亲生儿子刘劭(“元凶”)杀死。刘

收稿日期:2019-12-20

作者简介:顾农,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扬州 22500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骏是在消灭了哥哥刘劭以后上台当皇帝的，他在任的孝建、大明时代，文学相当繁荣，“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王俭传》）。刘骏创造性的举措之一是在朝廷里设立文学评论的专门官员——清台令^②，而他同时却高举屠刀，灭掉了许多政治上的对手。刘骏本人注意学习民歌，写了不少抒情小诗，颇清新可读，而其时鲍照、汤惠休（休上人）也努力向“委巷中歌谣”学习，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诗品·下》）。诗坛的风气一变而为眼光向下，这种风气在此后的齐梁时代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政治上收得很紧，而文学上放得很宽，创作非常自由——南朝的特色如此。

其次是涌现出一批与文学发展关系很大的太子和诸侯王，例如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萧齐的竟陵王萧子良、萧梁的昭明太子萧统等人，贡献都非常之大，刘义庆因极端谨慎而得以善终，而萧子良因被动卷入政变，萧统因无意中得罪父皇，皆匆匆而死，但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仍在，并长期发挥作用。

作家的数量在这一阶段急剧膨胀，而非正常死亡的亦复甚多，谢灵运被认为有谋反罪而被判死刑；鲍照同他主公临海王刘子顼一道死于动乱之中；王融密谋发动政变，未遂身死；谢朓卷入政局甚深，被觊觎帝位的萧遥光逮捕下狱，死于非命。在侯景之乱中，大批作家或死难，或逃亡。在南北朝时代，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几乎成了一种常态。

因为改朝换代，因为各类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文人学者经历苦难的更仆难数。这些人丰富的经历都化成了他们创作的资源和酵母。由南而北的庾信、王褒和颜之推，如果生活在承平的年代，他们也会写更多的作品，但内容和味道会完全不一样，很可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宫廷文人。

北朝同样是死了许多不幸的作家，他们同样是作为政治活动家而死于非命的。中国古代甚少有专事创作的作家，他们总是有些官职，中古时代尤其如此。于是他们受到政局变化的重大影响，几乎无可避免。崔浩之死以及因为受他株连而死的数百人，表面上看是因为《国史》而起的文字狱，其实有着复杂得多的政治原

因^{[2] 128-130}。文人最好不介入政治，至少不必深度介入，所以一开始就隐居或在官场里待一段就归隐，曾经是许多士人的选择，一个最为切近而成功的范例是陶渊明。南北朝时代也有隐士，只是其中文学家比较少一点。一旦彻底隐居，也就不必动笔了。

是创作还是保命？在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个问题。

二、从门阀贵族到书香世家

南朝作家里有一批是前魏晋贵族高门的后代，他们不同于其先辈的地方在于，这些贵族公子虽然继续跻身于官场，但已经甚少昔日的神采，也不能占据高位，再也没有出现过王导、谢安那样的宰相；他们更多地凭借高水平的文化、文学素养立足。正因为这样的家族同宫廷政治的关系拉得不算很紧，所以相对平安，成为声价甚高的书香世家，并以此为世人所仰慕。这样的家族成员中当然也有不满足于现状，意欲投身政治大显身手的，但是成功的比较少，大抵以失败告终，甚至死于非命。东晋那样的门阀政治原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南北朝时期军人集团的领袖控制中枢，南北的高门世族只能在他们手下效劳并得以分润若干利益。他们的优势逐步集中于文化、文学。由门阀贵族转化为书香世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色。

试看最受昭明太子萧统欣赏的多产作家王筠（字元礼，481—549）其人^③，这位琅琊王氏的一位代表人物曾经自豪地对后代说过：

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曰：“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

他这里虽然以爵位和文才并提，而重点在于上下七代人每人都有文集。爵位是祖先留下来的，只要不出大问题，就可以继续享有，而“人人有集”必须是几代人不断努力才能有的大观。

王筠之所谓“七叶”指他这一支派的七代人：

王导——王洽——王珣——王昙首
——王僧虔——王楫——王筠

第一代的王导(276—339)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参与东晋王朝的缔造,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之说。他的贡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3]55-77}。第二代王洽(323—358),乃王导诸子中最为著名者,曾任要职,可惜去世较早。第三代王珣(349—400),曾入桓温幕府,深得信任。以军功封东亭侯。能诗文,书法称大家,工行草,其《伯远帖》今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齐名,清乾隆帝合称为“三希”。有集十一卷,今存文十一篇、诗二首。第四代王昙首(394—430),他已到晋、宋之际,在帮助刘义隆登上帝位一事上立了大功,赠豫宁县侯,谥曰“文”。有集二卷,今存文二篇。琅琊王氏在南朝政局中大体能够左右逢源,其处境大大优于东晋晚期非常神气的陈郡谢氏。第五代王僧虔(426—485),活动于宋、齐之际,书法家、音乐家、文学家,今存文十五篇。王僧虔对于如何利用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来保护家族利益有着深刻的考虑。高门世族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4]712-725}。第六代王楫,梁武帝时官员,历官至太中大夫。第七代王筠,虽历任高职,但在政治上并无甚作为。王导是一代名相,而王筠只是一介文人,这样的流变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

琅琊王氏在南北朝时期还有些重要的文学人物,试举第六代的王俭、第七代的王融、王肃和第九代的王褒四位来看:

王俭(字仲宝,452—489),王僧虔兄王僧绰之子,因为乃父早亡,由僧虔养大,是当时著名的神童。成年后娶刘宋之阳羡公主,任秘书丞,依汉代的《七略》著《七志》,又作《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他依附萧道成,在宋齐易代后占据高位,而又风流文雅,长于骈体文,所作多为官场应用文字,为一代文人领袖。现在看去,他本人创作成就并不高,但由于地位的关系,齐、梁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沈约、任昉以及一流的评论家钟嵘等人,都曾在他的手下任过职,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永明体”领军人物之一的王融(字元长,467—493)是王昙首之长兄王弘的曾孙,与王筠为远房的堂弟兄。他是王氏后裔中最热心于政治的一个,很年轻时就死于非命。由南齐逃亡到北魏去的王肃(464—501)在促进鲜卑族汉化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出于王导另一个儿子王协这一个分支,曾经是谢庄的女婿,到北方后又与魏的公主结婚。由梁入北与庾信齐名的王褒(字子渊,511—574),是王俭的曾孙,诗文皆佳,又是书法名家。

由门阀贵族到书香世家的变化也见之于陈郡谢氏。谢氏变化的速度更快一些。陈郡谢氏的崛起相对较晚,而衰败却相当迅速,甚至当淝水之战胜利后不久谢安本人就遭到很大的压力,自我放逐到江北的邵伯(今属江苏扬州)去。晋、宋易代前后,随着谢混、谢灵运先后被杀,谢氏后裔迅即由政治人物演变为文化人物。

北朝世家大族的情形则颇为不同。他们在异族主导的政权之下过日子,即使应征出仕,根子仍然在其乡里,更多的成员往往世守其家园,培养在地方上的势力,既不主动参与政治,也不热衷于文学,只是传习儒家经典,立足于农耕经济,这样的耕读世家往往能久盛不衰。即使有个别出仕者获罪并株连部分亲属,而整个家族的势力尚无大碍。中、下层的世族尤其显得韧性十足,即使天下纷乱,仍然平安无事,并且能向高层社会和文化界不断地输送人才。

中古政治斗争中的反复震荡,使得居于高位的权势人物处于危险的境地,有时甚至会出现大批住在首都的高层人士及其家庭玉石俱焚,例如侯景之乱中首都建康遭受的浩劫,又如尔朱荣一举诱杀士大夫二千余人于河阴,这都是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灾难^④。历史的教训使得中古时代的高门逐渐由政治上十分活跃的贵族门阀演变为相对低调的书香门第,这样就比较长久了。后来常见的一副对联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思想的多元并存

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权威明显下降,道家、佛教的思想空前流行,思想界呈现多元化的态

势。《晋书·孝愍帝纪》引干宝论晋世风气的话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儒家及其倡导的道德名教受到严重的冲击，道家的影响非常之大，后来佛教流行，更形成三家鼎立之势。

到南北朝，儒家、道家、佛教三足鼎立之势更为明显，只须看两位名人对自己临终形象的安排就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这一点。

南朝作家、思想家张融（字思光，444—497）对自己的后事作如下的安排：“遗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张融传》）这样的形象表明他已经分别把儒、道、释三家统统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年辈略晚的道教大师陶弘景（字通明，456—536）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著作甚多，他晚年时梁武帝萧衍大力崇佛，于是陶大师也就与时俱进地敬重佛法，“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法琳《辩正论》卷六）。到临终前夕他安排自己的后事，更特别指定入殓的装束须兼综道、佛两家，其遗令云：“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祫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南史·陶弘景传》）这样的形象虽然相当怪异，却深合时宜，其安排得深刻细致堪称无以复加。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他们自称“信教”，其实是“吃教”，而不同的时候吃法不同，“有宜于专吃的時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5]310-311}。看清张融、陶弘景这些知识精英对自己临终形象

安排之深意，大大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这一时段历史文化的理解。

在南北朝时期官方的政策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仍然存在，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儒家思想的地位是远不如前了。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妇女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她们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才女，鲍照的妹妹鲍令晖、徐悱的夫人刘令娴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北方的妇女往往主持自家的门户，《颜氏家训·治家》说：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曲。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河北人事，多由内政。

按儒家的经典，或班昭的《女戒》，妇女是不能管这么多事情的。

中古后期，男人往往醉心于女性之美，男作家大写歌颂妇女的情诗，同样表现了儒家思想的衰微。唯其如此，南北朝的各朝代，都一再强调振兴儒学的重要，也采取过种种措施，官方的这种努力与实际生活中儒学的衰微互搏互补，共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四、求新求变的趋势

通观南北朝文学，可以明显地感到，相当多的作家纷纷努力于艺术上的创新。

刘宋以来，谢灵运致力于优美的山水诗，鲍照大写激越的乐府诗，都流露出创新的意向。刘勰批评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时序》），无非是从反面总结了这样的新变。元嘉体、永明体、宫体分别代表了宋、齐、梁三个朝代的新贡献，只有陈王朝完全跟着后期梁文学的路子走，显得比较沉闷无进展，正如这个王朝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新意一样。

山水诗是从玄言诗、田园诗演变而来，但仍然追求哲理的深度；宫体在华丽的外表之下，也未尝不含哲理。从这一面的发展变化中，最能看出南朝诗人始终不懈的艺术追求。

玄言诗多直接就来谈哲理；田园诗在家常的村居生活中领悟哲理；山水诗是在山川行旅中寻找哲理；而宫体诗则从美女艳情中观照生

活的真谛,认清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知《易》者不言《易》,真正懂得的道理往往无须在口头上大讲特讲。考察一下玄言诗的作者很快就能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玄学家,有的是玄学的爱好者、掮客和粉丝。玄言诗曾经风行一时,但其作品能流传于世者亦复不多。

最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就在极普通的田园生活中发现了诗意,而且体悟出人生的哲理。谢灵运其实也是在写田园,但是他太阔气了,大片的山水就在他的庄园之中,于是他的田园诗也就成了山水诗。试看他的著名诗篇《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这里的精舍即读书斋与其左近的巫湖,都是谢家产业。此诗把浙东山水表现得非常之美,而同时也没有忘记从这里去体悟人生的哲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意”和“虑”,要很惬意地看待生活和景物,少来一点焦虑,这样外物对他来说也就不那么重要,而养生也就有道了。

宫体诗固然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四》),题材比较狭隘,但值得注意的是只写“衽席之间”“闺闱之内”还不能算是宫体,这里绝对不能忽略的是宫体诗人对于哲理的追寻。曾经有人认为宫体诗人有荒淫之意,其实不然。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教训自己的儿子萧大心说,做人绝对不能离开传统的道德、正统的思想,又同时指出,至于写诗写文章,则不必受此束缚,要确保“放荡”的自由。而在这种“放荡”之中也颇含哲理,例如写舞蹈的诗:

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

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

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

取,谁堪白日移。

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

——庾肩吾《咏美人》

可怜称二八,逐节似飞鸿。悬胜河阳伎,暗与淮南同。

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腕动苕华玉,衫随如意风。

上客何须起,啼鸟曲未终。

——萧纲《咏舞二首》其二

庾诗写一瞥中的美人,她们都是天生丽质,并非只靠化妆,其美丽的容颜和装束自然是静态看最整齐,一旦舞动起来,那就乱了;天黑下来以后她们的情形如何,也不好说。萧诗重点写舞姿,时刻在变化之中,只要舞曲不停,她们将继续跳下去。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此美好的容颜和舞姿,其实都是虚幻的,无常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大约都是如此。

又如萧绎的《代旧姬有怨诗》:

宁为万里隔,乍作死生离。那堪眼前见,故爱逐新移。

未展春花落,遽被秋风吹。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

谁能巧为赋,黄金妾不赍。

这里说爱情是美好的,可惜同样虚幻而不能长久。宫体诗人总是在美好中看到变化和衰亡,在“放荡”的情思中饱含着幻灭悲哀。又萧纲《咏美人看画》诗云:

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

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

只有图画里的美人才能“长有好精神”,而在现实生活中,长久的美好是不存在的。凡此种种,都是佛教徒的感慨和情绪。

把这一切都看破,对美女和爱情都不再动心,人就得到解脱;将它们全都放下,就算超越了世俗,获得了真谛。宫体诗是暗含着哲理的诗,只是这里绝不喋喋不休地去说教,而文字的表面却充满了很有诱惑力的美女、鲜花和艳情。这样的诗显然是有创新意义的。

从理论上总结创新的必要,最早可能出现于书法理论之中^⑤,东晋以来书法成了领军的艺

术门类,于是在理论上也率先有所贡献;在文学方面,则萧子显(487—535)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是大有贡献的,他在这里写道:

习玩为理,事久则淡。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并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不相祖述,追求新变,是中古一大批作家共同的创作心态。创造性永远是文学的灵魂。

讲得最早也最透彻的也许是南朝作家、思想家张融,其《门律自序》有云:“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又说自己的文章“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而“传音振逸,鸣节竦韵”。中古时代讲究“新变”蔚然成为风气,甘心寄人篱下的大抵甚少;而张融则更是敢说即使是圣人的篱下也不必寄居这样的大话。

北朝作家也讲新变,但他们主要是付诸实践,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这样的长篇巨著,都是前所未有的写法。北朝后期的文学成就超越了南朝,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家诫家训一类的文章过去是有的,而像《颜氏家训》,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二十篇的大书,则是空前的贡献。北朝在诗赋方面无甚出新,大抵模仿南朝,而在散文方面却大放光彩,可见其富于新变的创造性也很强,只是用武之地各有不同罢了。

五、南北文学雅俗流变之异同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通俗化倾向,然后又提升为雅俗共赏。南朝主要表现在诗的方面,北朝主要表现在文的方面。

南朝士人之诗歌作品的通俗化主要应是受到了民歌的影响。那时南朝民歌的繁荣是空前的,《乐府诗集》卷六十一说: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寢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

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乐废矣。

这里提供的解释不免洋溢着儒家诗教的色彩,但介绍的事实是可信的。南朝民歌,特别是其中那些讴歌爱情的小调,确实风靡一时,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刘宋时代的大文学家王僧虔在《乐表》中说,当时“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宋书·乐志》),士人的创作遂亦不免受其影响。事实上早在东晋,孙绰、王献之等高层文士都用民间爱情小调的格调写过诗,陶渊明学习民歌作《蜡日》诗,就是他的《闲情赋》,也有受《子夜歌》浸润的痕迹。刘宋以后,此风更盛。

南朝注意向民歌学习的诗人很多,最著名的是鲍照,他的某些作品确实很像是“委巷间歌谣”,稍后有一批齐梁诗人对鲍照极其仰慕,通俗化形成了风气,其余波下达宫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辞,起源自昔……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

与鲍照、汤惠休一派通俗“美文”同时并存、互相竞争的是颜延之、谢灵运的高雅派作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稍后的刘勰也高度肯定这一派,《文心雕龙·时序》写道:“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颜延之主张走高雅的路线,看不起鲍照、汤惠休等人的通俗一派,说他们的作品“委巷间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南史·颜延之传》)但“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诗品·序》),正反两方面的说法都表明诗歌通俗化的路线影响巨大。

虽然作为史家的沈约高度评价颜、谢,而作为诗人的沈约却注意同时学习鲍照,更高明的是他力图将雅和俗结合起来,加以提高,开出了一条雅俗共赏的诗歌创作新路子。《南齐书·文学传》指出南齐诗歌的高明之处在于“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正是指以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新一代诗人综合了刘宋时代颜、谢与鲍的不同优点,更进一步的创新,“不雅不俗”,更上一层。谢朓不幸短命死矣,而

沈约颇为老寿,于是成就了一代文坛领袖,以他为旗手的“永明体”雅俗共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伟大的转折和新变。

北朝早期的文风相当通俗,其主要原因应是主导政局的鲜卑拓跋氏贵族虽然已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但还没有登堂入室,那时动笔的文人为了适应这种局面,行文自然倾向于通俗平易。我们看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的诏书,尽管大抵出于宫廷里的“笔杆子”之手,但文字都相当清楚易懂,不讲排偶,也几乎不用什么典故,例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的《灭佛法诏》写道——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魏书·释老志》)

这样涉及面甚广的重大政策法令是务必要求臣民们认真体会、严格执行的,所以文字自以通俗、简明、有力为宜,在当时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诏书中的几层意思,如果用典雅华丽的骈文写起来,那就会比较长而且难懂,却未必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诏书这种官样文章,其文风在古代多有重大影响,对此不能低估。

出于北方作家之手的散文名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魏书》等等,文字都比较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舒服。这些作品,用南朝理论家的话来说,乃是“笔”而非“文”。事实上,“笔”的生命力更为久远。

随着鲜卑拓跋氏统治者日益汉化,大批汉族士大夫进入北方政权机构并占据要津,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加深,也使得北方的文风渐趋于典雅华丽。北周政权和思想文化政策的奠基人宇文泰虽然大讲复古,实际上他在打垮萧绎以后十分注意接纳从江陵掳来的南方文士,吸收萧梁文化的营养来提高关陇的文化品位。庾

信、王褒进入北周以后,这里的文人纷纷向他们学习,进一步追求文字的骈偶华丽,形成了“梁陈派”的北方版。举例来看,北周的李昶(又名李那,后赐姓宇文,516—565)在保定元年(561年)有一封答徐陵书,略云:

繁霜应管,能响丰山之钟;玄云触石,又动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成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术。楚齐风马,吴会浮云,行李无因,音尘不嗣。殷御正衡命来归,嘉言累札。江南橘茂,冀北桑枯,阴惨阳舒,行止多福……

把应酬客气的套话说得骈四俪六,翰藻纷披。此信同徐陵那封文采斐然的来信堪称旗鼓相当,“工力悉敌”(《骈体文钞》卷三十谭献评语)。

隋统一中国以后,大批南方文人进入长安,追求华丽的倾向有增无减,以至于文帝杨坚要动用行政手段来提倡质朴的文风。此举有些成效,但回到北周或北魏的初期则是不可能了。后来《北史·文苑传》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这里说的绮丽与质朴之分,大抵和文雅与通俗之别同步共生。

南北朝至隋的文风正走过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道路,一路向前,迎来了唐代文学的高潮。

六、民族纷争与文化认同

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不仅有政权上的对立,还有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南方的汉族政权与北方鲜卑族和其他胡人(如匈奴别部后裔之宇文氏的北周)以及鲜卑化的汉人(如北齐高氏政权)当权者之间,互相敌视,南方骂北方为“索虏”^①,北方骂南方为“岛夷”,不同民族间的各种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风土气候等方面,都成为互相攻击和嘲笑的对象。而在种种斗争包括战争中,各族之间仍有强烈的文化认同,不同民族在纷纭的斗争中逐步走向了融合。

事实上先前在“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

入据中原割据称雄的许多少数民族领袖，早已纷纷汉化，认同于炎黄子孙、周孔礼义，例如鲜卑族慕容部中汉化颇深的，后来成为前燕创始人的慕容廆（269—333）就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得到过西晋文坛领袖张华的高度评价。慕容廆的一个高见是各族虽然风俗不同，但不必心存芥蒂。《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载：

高瞻，渤海蓚人也，随（崔）燭如辽东，燭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君中州大族，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遂以忧死。

慕容廆招降高瞻遭到拒绝时，深刻地指出高瞻有心理上的障碍，希望对方不要为某些“华夷之异”所蔽，应能体认到大中华的文化认同。可惜高瞻一时未能想通，不幸匆匆而死。

慕容廆的儿子皝（287—348）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雅好文籍，勤于讲授”；慕容皝的儿子慕容隽（319—360）“博观图书”，“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他们都是文化认同的典范。

前秦是氐族的政权，其领导人苻坚一向奉行“变夷从夏”的政策，政治很快上了轨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在历史上作出了贡献。

后来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部，由于久处边陲，离开中原甚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汉化的程度不及慕容部，也远不及前秦，但他们也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孝文帝改革就是要促进鲜卑族进一步汉化，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因为操之过急以及某些举措不当，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他仍然是相当英明的。隋唐以后，鲜卑族已完全融入汉族。北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孝文帝元宏的贡献尤其杰出。

文化认同的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痛苦、纷争和杀戮，在汉化的同时也存在鲜卑化的倾向，在痛苦中逐步前进。鲜卑族拓跋部中最早的汉化先锋曾经遭到无情杀害，后来元宏欲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

阳，阻力很大，不少保守的老派人物坚守塞上不肯南下，镇守边关的士卒也不可能跟着南下，他们的进步就相当地慢。迁至洛阳以后，孝文帝决定以汉语为正式的官方语言（详见《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六月条下），此时的阻力就小得多了，《魏书·咸阳王禧传》载：

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

情形大约是当时在南下的鲜卑人中汉语已相当流行，鲜卑族官员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官员大抵汉语纯熟，所以这一改革不算非常困难，只不过是把这一汉化的成果用圣旨和法令的形式彻底固定下来而已。语言的改易意义极其重大，文化方面的认同从此进入一个更深入的阶段。

后来六镇起义，高欢、宇文泰崛起，为后来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兴起导夫先路，他们分别采取了若干鲜卑化的措施，恢复鲜卑语的地位乃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但这只是一种笼络鲜卑武装力量（其成员多为汉化程度较浅之塞上鲜卑）的权宜之计，一种政治家的权术。等到他们站稳了脚跟，又重新开始其汉化的进程，再次强调文化上的认同，宇文泰依据《周礼》来建立政治文化，取得很好的效果；他对南方战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客气尊重，真心相待，体现了文化认同的高度热情。

北齐朝廷里虽然常常倾轧不宁，但其规章制度始终是合于传统的，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6]3-4}。这样的格局到隋王朝建立以后，更是水到渠成地完全落地了。

《木兰诗》表明，当时北朝民众在心理上并不与南朝对立，他们心目中的敌人是远在塞外但时来骚扰中原的柔然（“燕山胡骑”，燕山即燕

然山)人,他们乃是胡人。《木兰诗》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读,颇觉意味深长^[7]。

缪钺先生说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各民族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变化。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结集于一种高度文化之中而趋向于渗透、融合,破除种族界限,不断为中华民族增加新的生命力。在民族区别的看法上,文化重于血统,种族间的歧视是暂时的,而文化上的融合则是永久的。^{[8]303}

研读南北朝文学,人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华民族这种伟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全球史上是极其光辉、无与伦比的。

注释

①《南史·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载:“文帝以为中书舍人。上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每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郎才尽早于江郎(江淹)才尽,而知名度远不及后者,大约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八卦故事,而纯为韬晦之计。第一流的书法家王僧虔当时写字多用拙笔,也主动是向孝武帝让步,见《南齐书》本传。②《宋书·孝武帝纪》载,大明六年八月乙亥“置清台令”,《建康实录》(卷十三)介绍这个官职说:“初,自武帝(刘裕)永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故置此官,考其清浊。”③王筠作品甚多,晚年每任一官就编一部集子,所以有《洗马集》《中庶子集》《吏部集》《左佐集》《临海集》《太府集》《尚书集》等,后来虽均亡佚,而残存之佚文也还不少。《梁书·王筠传》载:“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

及刘孝绰、陆倕、到怡、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云:‘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④《魏书·岛夷萧衍传》:“初,(建康)城中男女十余万,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侯)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江左遂为丘墟矣。”《北史·尔朱荣传》:“(尔朱荣)乃谲朝士共为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悉命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四面围之。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皆敛手就戮。”南北高门经此二劫殆已死丧略尽。⑤详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四王僧虔《书赋》《全齐文》卷八王僧虔《论书》。⑥鲜卑族人习惯于将头发剃去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打成辫子。后来满族的习惯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4]汪春泓.论王僧虔与南朝文艺思潮[M]/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立雪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7]顾农.两首《木兰诗》的异同[N].文汇报,2019-01-18(09).
- [8]缪钺.缪钺全集:第一卷(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The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u Nong

Abstract: The different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ppearance of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enrich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writers, and increased their creativity and spiritual strength. The former aristocrats of the gate Lords have now largely evolved into literati families. 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has obviously declined, and various thoughts have been preserved in many ways, which have a common influence on writers' creation. Quite a number of writers are striving for artistic innovation. The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had a strong tendency of popularization, and then it was promoted to be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it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poetry, while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it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literature.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showed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integration in various struggles, including wars.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litical situation; gate lords; aristocratic families; refined customs; nation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原孟]